



川大史学·徐中舒卷

徐中舒

卷

徐中舒 著
徐亮工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 川大史学 ·

徐中舒

卷

徐中舒

著

徐亮工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庄 剑 徐亮工(特邀)
责任校对:何 静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大史学·徐中舒卷 / 徐中舒著; 徐亮工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14-3494-4

I. 川... II. ①徐... ②徐... III. ①史学-文集
②史学-中国-文集 IV. K0-53②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637 号

书名 川大史学·徐中舒卷

作 者	徐中舒著 徐亮工编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9.875
字 数	43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1 500 册
定 价	5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川大史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罗志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冉光荣	石	硕	孙锦泉	刘复生
任新建	何一民	何	平	罗志田	陈廷湘
杨天宏	徐亮工	郭	齐	彭裕商	舒大刚
蔡崇榜	霍	巍			

《川大史学》工作委员会

组 长：王挺之

副组长：孙锦泉、舒大刚（常务）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挺之	石应平	孙锦泉	李德英	陈廷湘
杨秀春	徐开来	舒大刚	鲍成志	霍 巍

秘 书：辛 旭

序

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

百余年来，张森楷、何鲁之、刘挾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澂、丁山、陈衡哲、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吴天墀、胡鉴民、任乃强、杨人梗、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闻宥、常乃德、钱穆、缪钺、蒙思明、萧公权、卢剑波、谭英华、萧一山、吴廷璆、杨东莼、周传儒、柳诒徵、韩儒林等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先后在此设帐授学，为川大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术繁荣的基础是不同学术风格的交流融会。回顾川大的史学发展史，至少可以辨识出三种主要的学术流派。首先是近代“蜀学”，尤其是其中的“文史之学”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在川大史学系任教的近代蜀学传人包括张森楷、叶秉诚、祝同曾、蒙文通等，在史学系之外则有龚道耕、刘咸炘、庞石帚等。在治学取向上，他们多重视古经、正史等基本典籍的训练，崇尚博通的治学取向，留意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新史学重视新材料扩充、重视问题意识等取向不

无距离。不过，这些学人也多少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具体情形又随个人和时代不同）。

其次是一批基本为 20 世纪中国新史学所包纳而又与主流有所疏离的学人，包括何鲁之、刘棐黎、李思纯、周谦冲、束世激等。他们或是留学生（多为留法者），或在国内受到较为完整的史学训练（多出自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在文化观念上，他们不赞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对主流派新史学不无批评，主张结合传统与现代，而思想资源则更多地来自西学。他们之中不少人热衷于引介欧、美史学新理论，如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史学观念上，他们强调过去与现在并非渺不相涉，不主张将历史事实做孤立考察，而更注重其连贯性；同时，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问题”的解决，而尤其体现为对现实的启示意义。用何鲁之的话说，就是侧重“史学智识”，而非“历史整理”。

上述两批学者在文化态度、史学意义的认知上都颇有同调之处，与其时在国内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史学有着较大差异。他们的学术取向对后者不无纠偏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大史学的影响力。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战以后，一批主流派新史家进入川大，对史学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川大史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了川大史学地位的迅速提升。

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是这一学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徐中舒的一手培养下，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在川大生根结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在考古学方面，田野调查与发掘之风兴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汉骥的提议和领导下，川大史学系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文物调查、三星堆、汶川石棺墓和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多项工作。

在注重实地调查风气的影响下，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如人类学、民族学也日益受到重视。30年代末，冯汉骥两次前往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40年代初，胡鉴民对羌族、苗族等民族进行了调查。1946年，任乃强在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

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成为川大史学的一大特色。40年代初，川大史地系表示，“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情形殊异，各校各具特色，如地方及专题研究，皆当因时、因地、因人而设置其最适宜之选修课（如川大因特殊环境与需要，即设有‘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学程，定为三、四年级选科），庶能发展特长，有益实用。”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到巴蜀史的研究中，这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早在1927年，徐中舒就将传统学人视为一脉承继的殷、周相代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斗争。同年，蒙文通也发表了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提出了有名的上古民族“三系说”。任乃强转入民族学，也是由地理起步。1941年，史学系正式改名史地系。虽然1947年史、地系分家，但对时、空加以综合研究的学术取向则一直延续至今。

就学术建制而言，今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学科。华大学者在中国边疆研究、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有独到之长，学术风格更近于主流派新史家。

华大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其中，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大学博物馆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名。另外，跨学科研究、注重边缘和底层文化均是其特色之一。

华大历史学科早期的领导者主要是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等外国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开始取代了他们的地位。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由李安宅负实际责任，研究所成员有郑象铤、任乃强、于式玉等。由于成绩突出，仅仅成立一两年的时间，研究所就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1943年年鉴》。1941年，博物馆馆长一职由郑德坤接任。他与林名均、梁钊韬、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学者一道，继续推进博物馆建设，组织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拉开序幕。华大历史学科全部并入川大，奠定了此后五十多年直到今天川大史学的基本格局。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下，川大史学研究形成了既注重新材料的搜集运用和实地调研，又注重基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注重专业化的“问题意识”，又注重“通识”眼光的学术特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川大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古文字学、地方史、考古学、民族史、西南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等传统优势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度成为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1981年颁布的首批博士点中，川大历史系就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两个专业入选。与此同时，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近现代

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城市史、世界上古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等也逐渐得到开拓，有的已跃居国内学界之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后被授予“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5年）、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000年）、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2001），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06年是四川大学建校11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总结100多年来的办学与科研成就，推动学术的新发展，在学校的统筹规划下，我们特决定出版一套15卷本的《川大史学》丛书，分为“大师卷”和“专业卷”两个序列。“大师卷”中收录了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李思纯、任乃强六位先生的著作，代表了川大史学在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应该说，长期在川大历史系工作而成就足以当得上“大师”之名的不止这六位先生，但这次由于时间仓促，不及为他们一一编辑专集，希望以后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专业卷”按照二级（或三级）学科分卷，尽可能地收录在川大工作过的学者的论文。其中既有已经享誉学界的名家，也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因此，文章的质量必定各有高下、参差不齐，但对于每一个曾经和正在为川大史学的建设付出热情与心血的学者，能够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应该说也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历史文化学院

2006. 7

从“书”里到“书”外： 徐中舒先生的学术与生平

(代前言)

徐亮工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史语所，就《徐中舒先生的学术与生平》这一题目向各位女士和先生请教。

七十五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傅斯年先生，以极大的气魄和见识力创办了中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学研究的专业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合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筚路蓝缕，经过数年努力，为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闯出了一条“新学术之路”。我的祖父徐中舒先生有幸在史语所开办之初便成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史语所开办之初的风风雨雨，分享了史语所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便取得巨大成绩的喜悦，在共同铺筑这一“新学术之路”的过程中，奠定了自己一生学业的基础。能够在先祖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缅怀追忆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生涯及学术业绩，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和激动，同时亦感到万分的惶恐和不安。我生既晚，加之大陆“文革”十年动乱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到1970年代末大陆恢复高考，我已年近而立，才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并在先祖身边侍奉问学。然由于学识、学力均浅，尚不及领会先祖学问百之一二，先祖便不幸身染重疾，无法工作和指导后学了。因此，承所方美意，嘱我在

此就先祖父的学术与生平作一介绍，一方面我觉得这是自己一份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又恐因我学识和学力的不够而不能很好地表达先祖父学问的真精神和真面貌。惟一让我稍可释怀者，即先祖父一生百余篇论著俱在，堪可供各位女士、先生明鉴。

徐中舒先生（为行文与演讲方便，以下径称“徐先生”）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3岁丧父，5岁即随母亲进入慈善机构清节堂，赖以为生（史语所已过世的李光涛先生与徐先生就是在清节堂里一起长大的发小）。童年的艰辛，求学的不易，在徐先生为悼念他的母亲撰写的《先母事略》中有生动详尽地记述，我将该文作为这篇演讲稿的附录，在此就不一一细述。这里仅就徐先生学业路径的形成、治学方法及主要的学术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一、学业路径：安庆初级师范学校、 清华国学研究院到史语所

1917年初，徐先生从安庆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师范三年，徐先生受国文老师胡远浚的影响最大。^①徐先生后来回忆到：

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级师范毕业，这时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我在这里啃了些中国旧书，在

^① 胡远浚（1869—1933），字渊如，号天放散人，怀宁县人。其父胡椿经营胡玉美酱园，自幼从叔父胡杰读书。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曾任怀宁县教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应严复之聘，任教安徽高等学堂。后任教安庆初级师范学校。民国十六年（1927）任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擅长桐城派古文，与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巨子吴汝纶（字挚甫）有交情。在学术上致力于老庄哲学研究，以老庄之学为宗，融儒、佛、老三家。有《老子述义》、《庄子诠诂》、《易述》等专著行世（参见《安庆市志》第1842页，待刊）。

这里我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很深。学校里学古文只是练习写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启示，就不能以此为满足。桐城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我就要求从这三方面充实我自己。^①

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②

学习桐城派古文对徐先生的另一方面影响是接触了西方思想，

我因为学桐城派古文，就读了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论》、《群学肄言》这一类的书。因为严复是吴汝纶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来翻译文章的，因此，我就开始接受了些资产阶级的教育，社会进化论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理论，从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动摇了。^③

以一本《康熙字典》为工具，熟读《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初步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这可以看作是徐先生从事学术事业的开端。

从安庆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先生两任小学教师，先后考取了同为公费的武昌高师数理系及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己兴趣不合而退学。又因胡远浚先生和时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董家会的推荐，分别在桐城方守敦家和上海李国松家坐馆任教，

① 徐中舒：“我的思想检查”。《人民川大》，第65期第四版，1952年7月14日。

② 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文史知识》，1987年6期。

③ 徐中舒：“我的思想检查”。《人民川大》第65期第四版，1952年7月14日。

讲授《左传》。“方守敦之父方柏堂（名宗诚）治宋学，著述甚富，所著柏堂遗书二十余种。……李国松之祖父李鹤章是李鸿章之弟，其父李经羲在清季曾任云贵总督，北洋军阀时代曾任国务总理”。^①方家、李家均藏书甚多，尤其是李家，还刻印书籍。徐先生在这里授课时间并不多，得有大量时间阅读东家的藏书，奠定了自己坚实的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海三年多的塾馆生涯对徐先生更重要的影响，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了传统文化之外的新学问和新风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彻底改革旧中国的思想弥漫全国。那时我在上海，上海出版的新书，我总是先睹为快。那时整理国故的呼声很高，古史的讨论很热烈，这都很合我的脾胃。……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传统的尊经观点，我是没有了。……我把以前所受到的封建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为新汉学奠定了基础。^②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古史辨”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徐先生晚年曾对我说起，他虽然没有参加这一讨论，但却十分关注讨论的进行。“古史辨”的方法论在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古诗十九首考》中就有所表现：古诗十九首“吾人今日实无法以断为谁人之作。惟关于作诗之时代，从著录上，或拟作中，或后人引用其诗，或由诗中语句含有时间性、空间性者，参互以推之，尚可略得其梗概。……吾人试取古代历史事实而考其原起，知大部

① 徐中舒：“我的简历”。1968年7月10日（未刊）。

② 徐中舒：“我的简历”。1968年7月10日（未刊）。

分皆由传说构成”。^①至晚年在论中国上古的禅让传说时更注意到，春秋时人和战国时人就有相当不同的认知：“春秋时代的人，把禅让制度加以理想化；而战国时代的人，把禅让制度加上家族私有制中篡夺的外衣。”^②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海，徐先生第一次接触到王国维先生关于古史的一系列文章：

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阙，遂于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窘丛书》中得读先生（引者注：指王国维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③

这对此后徐先生决然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有莫大的关系。

1925年9月，徐先生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坎坷求学后，以同等学历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李济诸先生。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在这里一年的学习中，徐先生受王国维影响至巨，尤其是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对他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关系至大”（详后）。其实，在这一

① 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载《立达季刊》第一期，1925年6月；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六卷六十五期重载。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5页）。按：“古史辨”对徐先生影响还可从后来撰写的若干篇论文中看到，如《陈侯四器考释》（载《史语所集刊》三本四分，1933年。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405—446页）中对黄帝传说的考辨。然与古史辨派不同的是，徐先生采用疑古的方法，做的却是证古释古的文章。

②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7—28页。此点承罗志田先生指教，谨致谢意。

③ 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1927年8月7日。

年的学习中，徐先生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徐先生在研究院毕业时提交了两篇论文，“殷周民族考”^①由王国维先生指导，“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指导教师则为梁启超先生，该文评语为“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②以文字证史，这本是王国维先生的强项，徐先生却转由梁启超先生指导，受梁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学从众师的愿望不难发现。

另一位对徐先生一生学问影响至深的老师是时任研究院讲师、后来成为徐先生在史语所多年同事的李济先生。^③尽管在这一年里，李济先生因忙于西阴村的考古调查，在研究院的时间很少，指导范围为“中国人种考”，开课亦仅限于“民族学”，但对于受桐城文派“惟陈言之务去”影响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徐先生来说，李济先生讲授的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这样一些崭新的知识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这可用以下三事说明之：

其一，徐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中李济先生指导的两名学生之一。^④徐先生于研究院毕业时所提交的论文《殷周民族考》的最后一段，有如下语句：“今之治人种学者，以肤发之色，区别人种。……疑黔首、苍头，皆谓其发之颜色。盖战国、秦、汉之间，尚有黔首、苍头之两种民族。……此问题所关至巨，要非纸上材料所能论定，姑发其疑于此。”以人种学治中国古史，在徐

① 该文发表时更名为：《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载清华学校研究院季刊《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26～32页。

② 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载《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三期。

③ 首先提出徐先生治学受李济先生影响这一看法的是陈力先生。参阅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载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第319～329页。

④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6页。

先生的研究中仅此一见^①，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李济先生“人种学”知识的影响及作者应用新知识的迫切心情。

其二，李济先生1926年1月14日在清华大学部演讲《考古学》^②，这是李先生回国后第一次就近代考古学所作的公开演讲。演讲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常识。徐先生应当听取了这次演讲，他在该年2、3月撰写的《〈木兰歌再考〉补篇》^③“导言”中，便提出了“先将国学基础建筑于历史考古学之上不可”的要求。考虑到考古学是一门新知识^④，作者不厌其详地解释道：

历史考古学之名称，所以别于史前考古学——即未有文字，历史以前之石器时代，原人时代……之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在国学上现时尚无若何关系，故历史考古学即简称考古学，亦无不可。

在此，文中所说的“考古学”似与近代考古学是一回事，接着所

① 到了1931年，徐先生已放弃人种学的观点，他认为：“仰韶与甘肃各地的人类遗骸经步达生博士测验过，也与现代北中国的人种没有什么分别。……汉胡文化的区分，在中国史上不必系于种族的差异，其差异的所在只系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不同。”（《再论仰韶与小屯》。载史语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145～181页）。

② 《清华周刊》375期（1926年4月26日）刊出，章熊笔记。又见李光谟先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按：是书第87页于该文标题下注明“1926年4月16日在清华大学大学部的演讲”，文末又云“原载《清华周报》第三七五期，1926年4月16日”，可知是将刊出日误记为演讲日，参《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该条材料出处由查晓英女士提供，谨致谢意。

③ 徐中舒：《〈木兰歌再考〉补篇》，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一号，文未注“十五、三、二，脱稿于北京”。

④ 新考古学的知识其实从上一世纪初即已传入国内，但主要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传播。对于来自上海的徐先生而言，这确实是一门崭新的知识。参阅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论则其不然：

一涉考古范围，吾人便联想而及清代汉学家之工作——考据或称考证。——汉学家之考据固多精确不刊之著作可为吾人今日之模范，然今之考古学与汉学家之考据其根本实有显然不同者：自其动机言之，汉学家为昌明经学或阐扬名教而考据，考古学则为明了某时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态度言之，汉学家专尚功力而忽略理解，考古学首重理解而亦不废功力；自其方法言之，汉学家囿于儒家独尊之下，缺乏参考比较之资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观，考古学本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广搜参考比较之资料，故得作客观的整理。

虽然强调“为明了某时代、某事物”、“重理解而亦不废功力”和“历史进化的观点，广搜参考比较之资料，……作客观的整理”，表现了一种崭新的史学观。但这里的“考古学”，与李济先生演讲中所说的“掘古坟”的近代考古学大相径庭。仔细读完全文，其内容所及全为文学史领域，与近代考古学无涉，“考古学”即用其字面意义——考古之学。然而，提出“考古学”之名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界定，至少说明新学科新知识对徐先生学术思想的冲击。

其三，徐先生1927年发表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1926年完成时原名为《殷周民族考》，发表时改今名。就其特别增加“从古书中推测”之定语，似乎已觉还当运用非“古书”的材料，亦即考古学材料（含古文字学材料）。^①另外，在徐先生1930年3月29日致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先生的信

^① 此点承罗志田先生提示，谨致谢意。由该文中所言“此东西两土之民族，是否为一民族？此问题在人类学地质学未有新发见以前，吾人实不能加以证明。惟就其分布之迹论，则似宜分为两种民族”大致可知，非“古书”的材料即“人类学及地质学（即考古学）”。参阅上揭查晓英之硕士学位论文。